

錢鐘書 與中國文化 精神

QIANZHONGSHUYUZHONG
GUOWENHUAJINGSHEN

臧克和 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K825.6/493

錢鐘書與中國

文化精神

臧克和 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246286

SWT964/04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 钱钟书与中国文化精神
作 者: 臧克和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印刷十一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8.5万
版 次: 199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7.20元

ISBN7—80579—210—0/I·174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小 引

十九世纪之末造，本世纪之肇始，中国近代文化学术思想，特别是在第一次将中西学术思想沟通的意义之上，是王国维辈作了承上启下的集成总结；二十世纪末，“钱学”创辟，于一个时代之文化学术，不啻集大成，开风气；诚盛事也！

尔来屡睹时贤，或玩赏默存先生之文学，或解会槐聚大师之学术；至有选家日出，译注可待，校勘补正，探幽发微，系年荟辑，用力维勤者，则此学之研究，必将出现空前之盛况；可预卜也！

余，操不精之“雕虫”术业者，何敢附庸大雅。然耽玩《管锥编》五卷，亦历有年所；又，《管锥编》实“经天纬地”之人间今日第一钜著也，余管窥锥指，不揣浅陋，每有会心，欣然命札，以至于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向以催进学术为己务；学长安南，必欲付梓。余即以此辑聊为《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之外编，倘诸同好以为是辑不无一言可有裨于解读“钱研”之“管学”，是端赖安南学长之苦心，于余亦何幸如之！

然则是书谓之读书札记可也。吾国学人，于人于己皆有求

完之责，是以己之早年所作，壮即有悔：必痛加删改甚且付之一炬，以示自家出手之初，即凡响非同。余重翻曩昔所作，其心粗气浮之态，不免汗颜；余亦有旧作翻新之大方便，脱胎换骨之大自在。然竟硬了头皮，一仍其旧；亦由是可得见新旧心力之不齐——或者说，视旧作之心境，今日原也清静老成不了多少；其心粗气浮尤甚也是有的。

臧克和

一九九一年六月

目 次

小引

一、“类”与“型”：钱钟书文化哲学思想中的“类意识”（1）

1.1 “与天为徒”（1）——1.2 “科学是对类的意识”（2）——1.3 “类”的联系（3）——2.1 “连类”与“对偶”（4）——2.2 “词肥”与“义瘠”（5）——2.3 “一”与“不一”（7）——3.1 “以类评文”（8）——3.2 “在水一方”（9）——3.3 追溯原“型”（10）——3.4 考察流变（12）

二、“望”字取象：“登高望远”的文学母题及其意象流转（16）

1. 《管锥编》关于“登高望远”文学类型的拈出及阐释（16）——1.1 “登高望远”作为文学意境之诞生（16）——1.2 “登高望远”作为文学类型的表现形态（17）——1.3 “登高望远”作为文学类型的心理基础（18）——2. “登高望远”类型的语言文化哲

学疏证——2.1 “登高望远”作为文学类型的语言表象
 (20)——2.2 “登高望远”作为一种祭祀仪式(21)
 ——2.3 “登高望远”蕴含的情感辩证法(25)——
 3. “登高望远”之象的转型：“在水一方”(27)
 ——3.1 “河水”意象的变型之一：“道阻且长”(27)
 ——3.2 “河水”意象的变型之二：“既清且浅”(28)
 ——3.3 “河水”意象的变型之三：“此岸”即“彼岸”
 (28)

三、汉字之取象·诗歌之拟象·易理之立象：钱钟书“易象”文化哲学思辨录 (31)

1. “象”之对应于义理、词章、考据(31)——
2. 古汉字取象即“语象原”之特征(34)——
3. 汉字之具象与易理之立象异同辨(37)——
4. 汉字取象与诗之拟象异同辨(42)——5. 诗之拟象与易之立象异同辨(44)

四、“不信人间有古今”：钱钟书论汉语文字可得“打通”中国学术思想(49)

1.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49)——2. “衣”：中国“文章”之精神(52)——3. “诗”：中国造艺之精神(58)——4. “豕”：中国文化里“猪八

戒”取象的原型意义(61)

五、“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关于地域学术思想的“打通”(65)

1. 学人间关于南学北学异同论(65)——2. 南北地域与两种学风的关系(70)——3. 南学北学研究方法论(72)

六、“小学”与“诗学”：钱钟书关于义理、词章、考据的“打通”(76)

1. “沿波讨源”与“推本穷末”(77)——2. “出乎其外”与“入乎其内”(81)——3. “历时比较”与“横向沟通”(84)——4. “知常”与“通变”(89)
5. “一边”与“多边”(93)——6. “反者道之动”(95)

七、“异质同构”：《管锥编》里所特别注重的一种联系(99)

1. “异质同构”论的语言训诂学意义(100)——1.1 “背出分训”(100)——1.2 “偏转流变”(105)——1.3 “词同质异”(105)——1.4 “语段意合”(108)——2. “异质同构”论的美学文艺学意义(110)——2.1 “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111)——2.2 “庸音”“嘉句”共济一章(113)——2.3

“情感杂糅”于一体（114）——2.4 “相反相违”之
“二重性格”同在一人之身（115）

八、灵·神·疾：《管锥编》宗教思想疏证 （118）

1. 灵：巫一体双边、一身二任（118）——2. 神：
鬼怪神灵、分合流变（124）——3. 疾：巫蛊术的两
大类型（131）

九、中国“说部”叙事智慧的总结：《围 城》文化哲学谈屑（143）

1. 中国“说部”叙事智慧的两条主线（143）——
2. 《红楼梦》→《围城》：“太虚幻境”到“存在虚
无”（144）——3. 《儒林外史》→《围城》：“生
命漂泊”到“人生失落”（148）——4. “无由接近”
的“城堡”与“无以冲出”的“围城”（152）

十、“句样”：民族思维的语言表象与深 层结构（155）

1. 小引（155）——2. “句样”范畴论（156）
3. “句样”“句型”异同论（157）——4. “句
样”生成论（160）——5. “句样”考察价值论
（168）

十一、“风土”到“月旦”：从“胡言”一词的语源学考索看钱钟书对汉语词汇学理论的贡献（182）

1. 汉语多“胡言”（182）——1.1 “胡言”之语源（183）——2. 从“风土”到“月旦”（183）——2.1 “胡言”的两层派生基础（185）

十二、句法·句型·本文·互文：“圆解”的实现方式（187）

1. 《管锥编》所使用的语言学概念系统（187）——2. 句法（190）——3. 句型（196）——4. 本文（202）——5. 互文（206）

十三、建构世界的语言：钱钟书语言谐趣论（215）

1. “滑稽”的训诂学意义：“谐”、“不谐”（215）——2. “滑稽”的语段类型：音之谐、形之谐、意之谐（218）——3. “滑稽”的心理基础：“无碍”、“确夷”、“格式塔”（225）

十四、“管”与“锥”：《管锥编》校疏

杂志廿餘则（231）

- 3.1 “垂髯”（233）——3.2 “士无不贤不肖”（234）
——3.3 “刺谬”（234）——3.4 “杀君马者路旁儿”
（235）——3.5 “嗜哑”（235）——3.6 “缀百氏”
（236）——3.7 “昌言”（236）——3.8 “举动多
宜”（237）——3.9. “妍蚩”（238）——3.10 “乐英”
（238）——3.11 “照其能”（239）——3.12 “漱石
枕流”（240）——3.13 “隐”与“彰”（241）——
4.1 “因”：作为释典语言（241）——4.2 “自注”之
体例（242）——4.3 “争气负高”（243）——4.4
“若无毛质”之所本及《管锥编》之“体”之“用”
（244）——4.5 “梦”及《管锥编》所用校勘术语
（244）——4.6 “息”（245）——4.7 “虚往实归”
之所本（245）——4.8 “长谣”（246）——4.9 “分
张”（246）——补订1. “出门西向笑”之所出
（246）——补订2. 义理、词章、考据打通举隅
（247）——补订3. “情感中自具辩证”（249）——
补订4. “观物由整体到局部”（249）

十五、《管锥编》读书杂志三则（250）

- （一）中国画论疏要（250） （二）论《太平广记》
（257） （三）论《史记会注考证》（263）

一、“类”与“型”：

钱钟书文化哲学思想中的“类意识”^①

1.1 “与天为徒”

庄生曰：“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篇里的这段话，似一向未引起谈艺者应有的注目。其实，这三言两语，却是谈言微中；无意之间，已是道着了我国古曲诗文“比兴取类”的哲学基础（关于我国古代艺术哲学里的“比兴取类”问题，拙著《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里面的《论取类》部分，曾有过专节的论述，兹略去）。这里的“徒”，自然是“徒属”之“徒”，也就是“类”的字义。在庄周看来，大凡认为天和人是合一的，那就是和自然同类；大凡认为天和人不合一的，那就和人同类。设若不是将天人对立起来的，就称得上是“真人”。

不妨稍稍回顾一下我国古代的文论、诗论的有关情形罢。陆机《文赋》云：“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萧子显《自序》道：“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钟荣《诗品·序》谓：“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称：“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目既往返，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

答。”……“与天为徒”，往往就表现为“天人相应。”大抵人类毕竟是同一类属，心理活动也就自然有相通的规律；而人类的心灵世界，也就有可能在一类相同抑或相似的客观物象上面披露出来：由是而可推演中国古代艺术哲学的底蕴。

1.2 “科学是对类的意识”

费尔巴哈尝言：“科学是对类的意识。在生活中我们跟个体打交道，而在科学中我们是跟类打交道。”②斯说揭橥科学之真谛，诚不易之论。马克思更推演道：“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由此更进一步云：“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③换言之，“类生活”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类认识发生发展的历史。这样，我们似乎可以推导出如下的一些结论来：每个人对个体（种）的真正认识，实际上不正是从对于类的本质把握开始的么？“种是多，而类则是一”，“只知有种不知有类”就不可能认识整体因而不也就谈不上真正认识个体的么？即是人类对于客观事象观察的视知觉理论的最新研究也在向人们表明着：“视知觉不可能是一种从个别到一般的活动的过程，相反，视知觉从一开始把握的材料，就是事物的粗略结构特征。”④

1.3 “类”的联系

我国古代艺术哲学多讲“类”，诸如“事类”、“义类”、“联类”等等，尤为习见惯道。大旨就是表现“一类”；在那具体作品的有限天地里，取得与“一类”的联系、沟通。而评判家的职责，也就是发现并寻绎出这种“类”的联系来；由此而领略到人类心灵运行规律类型，由此而披露出人类情感流动类型，由此而把握那人类审美经验类型。这大概就可以算得上科学的资格罢。真正大家手眼，正法眼藏，作的也就是这种科学化工作。不论他是宏观把握，抑或是微观洞察；不论他是纵横六合，抑或是辨析毫厘，他实际上都是在进行关于“类的意识”活动：通贯微至，上诉真宰，与造物者游。智者尝感喟：由约至博难，而由博返约尤难；同中见异难，而异中求同尤难。滑稽异同，最是才情。钱钟书先生竟然发现“殊情”亦有“通贯”之处，甚至“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⑤。读者不可不察，贯彻在他的宏篇巨制之中的，一是关于我国古代艺术哲学中的“类”的精义的探幽发微；一是关于“以类论文”范式的创辟实践。要之于具体现象之中作形而上的审谛和至观，道器不二，体用为一。^⑥

可以说，钱钟书先生首次系统阐释了“类”的讲究在中国古代艺术领域里的义谛。这，跟他的其它文化哲学见解一样，几乎散见于一系列宏篇巨制的整体之中。面对如此坚实的东西，笔者所能做的，也如同对待他的其它文化哲学思想一样，只能作些寻绎、疏证式的描述。

2.1 “连类”与“对偶”

“连类”首先被确认为古代诗文中最为常见的修辞的方式：“夫排类数件，有同簿籍类函，亦修词之一道。”^①据笔者涉猎所及，《管锥编》在论《史记会注考证》部分始揭举“比物连类”的源流沿革。钱钟书先生谓：“连类”在初即指称所谓“对偶”：

“偶俪”、“对子”即马迁所谓：“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比物连类”出《韩非子·难言》：“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枚乘《七发》铺展为八字：“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宋书·王微传》微奉答始兴王濬牋书，“辄饰以辞采”，因与从弟僧綽书自解曰：“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②

“连类可悲”一语，殆化用马迁此句，由是，“连类”一词，就庶几与“词采”为同义语。点缀故事，博采事类，就差不多成为后世骈体文之滥觞了：

偶俪之词，缚于散行，能使“意”寡而“视”之“如似多”也。《四库提要》卷一八九《四六法海》条亦云：“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

《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⑨

2.2 “词肥”与“义瘠”

说到底，“取类”、“偶俪”语言学意义的发生，乃客观存在的事相使然罢，大抵“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二柄，正反仇合，倘求义赅词达，对偶攸宜”。^⑩但是尝见一些当时颇有些声势的作品，算得是尽了偶俪铺比的能事，力图达到“意寡而视之如似多”，终因“繁采寡味”，而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这就恰如钱钟书先生所指瑕的“词肥义瘠”抑或“假象过大”了。殊不解，“取类”的真正义谛在于沟通人类的心灵，为读者提供无限多的“联系”的渠道。

魏晋以降，人们对以取类铺比为特征的汉代大赋即已褒贬参半，毁誉不一。刘勰即以“艳”字品题相如的《上林赋》的“取类”，道是“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钱钟书先生则在比较相如与枚乘赋的优劣高下过程中体现了自己关于“取类”的主张：

然相如所为，“繁”则有之，“艳”实未也，虽品题出自刘勰，谈艺者不必效应声虫。能化堆垛为烟云，枚乘《七发》其庶几乎。他人板重闷塞，堪作睡媒……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对“繁类”的一笔抹煞：

然小说、剧本以游戏之笔出之，多文为富而机趣洋溢，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中，旌旗壁垒一新。……尽俗之言，初非尔雅，亦非赋体，而“繁类”铺比，妙契赋心。^①

《尔雅》首创按内容性质分类释词之体例（具体言之，则有两类：一是如《释詁》、《释言》、《释训》三篇，把许多意义相同的词放在一起，在其下作一总括的解释。二是如《释亲》、《释宫》、《释器》、《释乐》等十六篇，将内容有关的一类词放在一起，而分别训释）。要是照了如上的“取类”准的，即令贾谊《过秦论》这样的鸿篇，也是难逃“瘠义肥词”的指瑕的。

《过秦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按晋后人当曰：“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意，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

但关键还不在于这词语的对偶、句法的配合的表面：

倘“四海”、“八荒”词不偕妃，则句法无妨长短错落，今乃读之只觉横梗板障，折散语言眷属，对偶偏枯机陞。“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四者一意，任举其二，似已畅足，今乃堆叠成句，词肥义瘠。

即令一般的语用学上的所谓对偶，也恐怕并非仅仅是着眼于表面形式上的齐整的考究。大凡“对子”的结构，“作为一个对